

生活感悟

记忆中的绿皮火车

□ 时间海

车厢轻轻摇晃着，像岁月深处传来的一声叹息。一股熟悉的、带着咸鲜气息的香味，毫无预兆地钻进鼻腔。是对面那个年轻男子，正捧着一碗泡面，白色的热气袅袅上升。蒸腾中，我的视线恍惚了。我看到的仿佛不是他，而是多年前，坐在这同样摇晃的绿皮车厢里，我的父亲。

他那时还年轻，病痛却在他身上刻下了痕迹。他小心翼翼地撕开红色的酱料包，深褐色的膏体粘在塑料膜上，他总用力地抖几下，指尖常常因此沾上零星的油渍。接着是那根火腿肠，他用牙咬开，然后，用那双骨节粗大、此刻却格外轻柔的手，将粉红的肠一段一段压进翻滚的面汤里。面饼在沸水的浸润下，渐渐舒展开，发出细微声响。他做这些时，神情是那样专注，仿佛在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。他抬起头，隔着升腾的蒸汽对我笑笑，说：“路上吃这个，最香。水不够热，要把开头的那段水漏掉。”他的声音混在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“哐当”声里，是我那段

日子里最坚实的背景音。

那些年，这墨绿色的长龙，便是我们生命的摆渡船。它吞吐着浓白的烟，不知疲倦地往返于家与那个遥远的城市之间。850公里，地图上不过几厘米的一条短线，现实中却是望不到头的铁轨，是窗外从青葱平原渐变到起伏丘陵的风景，是20多个小时缓慢而确切的位移。晨昏，就在这单调的“哐当”声里交替。我们去时，怀揣着对医院所有的想象；归时，行李箱里装着沉甸甸的检查报告和一颗暂时安定的、却依旧悬着的心。这车厢，便成了我们临时的、移动的家。

硬座车厢的夜晚总是格外漫长。灯火稀疏的原野在窗外大片大片地掠过，偶尔有零星的光点，像流星般迅速地滑向后方。车厢顶灯昏黄，多数旅人蜷在座位上，沉入颠簸的梦乡。只有我们小桌板上的一方天地，还亮着暖光。两碗面对放着，中间是掰成两半的卤蛋和几包榨菜。父亲总要把他碗里多出

的几片菜叶、几片牛肉拨到我这边。“你吃，我不爱吃。”他说。塑料叉子很轻，我们用它笨拙地挑起面条，有时因为车身的晃动，面汤会洒出一滴。那面其实味道单一，甚至有些咸腻，但在那一刻，在车轮永不停歇的韵律里，在父亲平静的陪伴下，某种奇异的温暖盖过了一切。我们把生活的颠簸、病痛的未卜，连同这粗糙的食物一起，细细地咀嚼，竟也从中嚼出了一丝相依为命的、近乎错觉的甜。

如今，再闻到这密闭空间里弥漫开的泡面香，我的眼眶总会没来由地一阵发烫。那热气仿佛有形状，能瞬间模糊眼前的世界，勾勒出车窗上那个早已不在的、沉默而坚毅的身影。我忽然明白了，思念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悲恸。它藏在最寻常的感官碎片里——是撕开调料包时那“窸窣窸窣”的、清晰得刺耳的脆响；是蒸汽扑面而来时，瞬间朦胧了视野的温热与潮湿；是味蕾被那熟悉的咸香唤醒时，心底猛然塌陷的一块。

记忆的列车仿佛从未到站。它依旧在时光的轨道上匀速行驶着。而我清楚地知道，在某节我永远回不去的车厢里，有一个靠窗的座位空着。窗边的小桌板被擦拭得很干净，上面静静地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，火腿肠妥帖地埋在里面，一切准备妥当，仿佛在等待谁。那空位，替我温着那碗面，也替我温着那句在喉间滚动过无数次的、却最终被呼啸的风声和胆怯吞没的话：“爸，这次……换我给您泡面。”

列车驶入隧道，窗玻璃骤然变成一面黑色的镜子，清晰地映出我此刻湿润的眼睛。我低下头，对着空气中那无形也无应答的过往，轻轻翕动嘴唇，终于无声地说了出来。

有些食物啊，咽下的是再也追不回的岁月，而回甘的，是时光也带不走的、名为“永远”的滋味。那列绿皮火车，载着我，和我的父亲，驶入记忆的苍茫暮色之中，只剩汽笛的长鸣，在心底悠悠回响。

诚征叙事、随笔、散文等文学佳作，要求文笔明快，内容积极，富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，力推原创，既欢迎名家精品，也厚爱新人佳作，字数1500字以内为宜，投稿邮箱：516558132@qq.com

征文启事

乡音乡情



前几日，与邻居步行去超市，邻居为抄近路，特意领我走了一条附近的胡同。这条胡同虽与我住的小区近在咫尺，我却已有二十余年未曾踏入。跟随邻居的脚步迈进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胡同，看着那些老房子，儿时关于胡同的细碎过往，瞬间在脑海里一一浮现。

消失的老胡同

□ 刘宏杰

提起胡同，如今在楼房里长大的孩子大多未曾踏足，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，从来都离不开胡同。“胡同”源于元代蒙古语，是北方街巷的通称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生活的这座小镇，除了寥寥几个单位是楼房，其余皆是平房。纵横交错的马路将小镇分割成若干区域，每个区域里都遍布着条条胡同，百姓的民房在胡同里一家挨着一家，各条胡同又由小路相连，岔路多的胡同，走起来就像迷宫一般。如今问起各家住处，答的都是某小区，放在过去，说的却是某条胡同；那会儿找人，全靠挨家挨户打听，胡同里时常能看见推着自行车问路的人，成了那时独有的光景。

从前，胡同邻里相处得格外融洽，大家都爱串门聊天，尤其在夏日傍晚，胡同的空地上，总能看见三三两两的大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。胡同里的孩子们，更是过得无忧无虑，夏天结伴嬉戏打闹，冬天滑冰车、打冰嘎……小伙伴们凑在一起总也玩不够，非得等家长在大门口扯着嗓子喊上半天名字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别看那时胡同里没有超市、便利店，却少不了小卖铺，打酱油、买陈醋，孩子的雪糕、大人的啤酒……日常基本需求都能满足，而这些“跑腿”的活儿，自然都落在了我们孩子身上。

在孩子们眼里，住惯了自家门前的胡同，总想着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。从小学四年级起，父母便不再接送我上学，我和胡同里的几个同学结伴步行，我们不爱走宽阔的马路，反倒偏爱在小镇里条条胡同间穿梭。走得多了，哪条胡同到学校最快、哪条胡同路况最好，都烂熟于心，那些曲折的胡同，藏着我们最肆意的童年时光。

胡同里满是浓郁的市井烟火，却也有让人挠头的地方。那时的胡同都是土路，坑洼不平，一到夏天雨季，胡同里便积满大大小小的水洼，百姓出行十分不便；卫生条件也不尽人意，杂草丛生、垃圾散落，就连厕所也是破烂不堪，这些都是当年困扰着老百姓的难题。不过说来有趣，小镇的胡同名称，大多和临近的单位相关：五金胡同、北市场胡同、土产胡同、乳品厂胡同、鞋帽厂胡同、酒厂胡同、冷库“九十九家”胡同……我家当年住的胡同，西边是开关厂，东边是二轻局胡同，家就在这条狭长巷子的中段。白天走这条胡同倒还好，若是晚上，独自走在漆黑的巷子里，总免不了胆战心惊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
1996年，父亲单位盖了家属楼，我们一家彻底搬出了胡同；又过几年，爷爷奶奶也离开了住了大半辈子的老胡同，此后那条承载我童年的胡同，便很少再去，前后院的老邻居，也渐渐难得一见。2012年，城区改造的浪潮袭来，老家那条胡同的老房子悉数被推平，取而代之的是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，我结婚后的家，便安在了这片崭新的土地上。回迁后，昔日胡同里的老邻居们再度聚首，闲暇时围坐在一起，总爱追忆胡同里的旧时光，那些细碎的过往，成了我们共同珍藏的念想。巧的是，与我一同去超市的邻居，正是当年胡同里的老相识，而我们此番穿行的胡同，恰是当年我和小伙伴们上学时，日日穿梭的那条老路。

时至今日，小镇里的胡同越来越少，许多胡同的名字，早已淹没在时光里，只留存于一代人的记忆中。现存的胡同，路面硬化平整，卫生环境也有了飞跃式提升，再也见不到当年的泥泞与杂乱，可那份质朴的邻里温情、肆意的童年欢闹，却再也寻不回来。那些消失的老胡同，带走的，是旧日的烟火日常，留下的是刻进骨髓的乡愁，它们不仅是一代人的成长印记，更是一座小镇变迁的见证，藏着我们再回不去，却永远珍视的岁月悠长。

那年那月

一张老照片

□ 方纲

距离拍摄这张老照片，已经过去了40多年。

照片里的15个人，分两排，前排从左至右为：当时的开鲁县政府副县长成万军、统战部长王振江、中国音协副主席孙慎、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孟波、中国音协主席吕骥、开鲁县委书记王志；后排从左至右为：第一个是我，当时在县宣传部当干事，接着是开鲁县民政局副局长宋占一，长春艺术团创作员乔书田，哲里木盟文联党组书记、诗人王磊，开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崔振廷，开鲁县文化局副局长陈宝昌，内蒙古民族大学师范学院教授、学者王保林，吉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专家陈美琦，开鲁县文化馆副馆长刘训。其中，乔书田与孟波合著《麦新传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王磊的叙事长诗《大刀歌》、王保林的《大刀的故事》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；陈美琦的《大刀进行曲及其他》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，也算是研究麦新的学者群英荟萃。



1982年6月，中国音协牵头，内蒙古文化局、哲里木盟文联、开鲁县委等六家联手在通辽举办纪念音乐家麦新牺牲35周年大会。8日，大会移师开鲁县麦新烈士陵园，举行吊唁活动。活动期间，有记者提议开鲁代表与领导、嘉宾合影，才有了这张合影。我站在后排的边上，是后补上的。因为原本我就不在开鲁县参会的10名代表里，临近开会，有外省区的代表请假空出来名额，会务组通知开鲁再增加参会人员，我才有了这次机会。非常难得的是，那是唯一一次全国性纪念麦新的活动。

合影归合影，我能认出孙慎，可他却并不知道我是谁。21年后，我要出版《麦新研究文献集成》时，经汪毓和教授联络，贸然前往翠微西里拜访了孙慎。他热情地讲述了与麦新的往事，还到书架上为我们寻找与麦新相关的资料，找来了《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》和吕骥编辑的《新音乐运动论文集》，还找出他自己编的《战地新歌》。那本薄薄的小册

子中，选用了麦新创作的《游击队歌》《战地秋收歌》等12首歌曲和理论文章《一年来战地音乐工作的经验与教训》。同时，他又找来1995年第6期《人民音乐》，书里面有他为麦新诞辰8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。孙老待人平和亲切，我们几位初次登门拜访的晚辈，原本心中满是敬畏和拘谨，见面后便全然放下了。临辞别，我大着胆子说出两个请求，一个是请他为《麦新研究文献集成》担当编篡顾问，另一个是为我编的这本书题词、为麦新殉难地纪念碑题签。孙老爽快地答应了，让我留下联系方式，写好了寄去。回到开鲁没几天，就收到了孙老的题词。后来，他还为《麦新研究文献集成》著作卷撰写了序言，又为我的长篇小说《冰上火车》题了词。

小时候听老人讲，但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，大多都有贵人相助。如今我才真正明白，即便像我这样的普通人，想要做成一件事，一路上也会遇见很多贵人。没有贵人相助，研究麦新真比登天还难！照片中的孙慎是我的贵人，孟波、乔书田、王磊、王保林、陈美琦和成万军、崔振廷、王振江、刘训也是我的贵人，他们都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。

豆腐坊

□ 李洪彬

计划经济时代，庄稼拾掇进场院以后，塞北的白天也渐渐短了。刚要入冬，农村便改成吃两顿饭，而生产队院内紧靠东北角的那两大间豆腐坊，人间烟火却愈发旺了起来。

在当时，豆腐算得上百姓餐桌上的奢侈品。用石磨慢慢磨压出来的豆浆，饱含着社员们辛勤的汗水，凝结着丰硕的喜悦，也彰显着豆腐匠人精湛的技艺。做豆腐要经过浸泡、磨浆、煮浆、扬浆、过滤、点浆等繁琐而细致的工序，才能做出新鲜的豆腐。

记忆里，我们生产队那位人称“邵老三”的豆腐匠，在几百户人家的屯子里，手艺是最精湛的。集体时期，生产队开豆腐坊是一举两得的事：一是为了改善

社员的伙食，二是剩下的豆腐渣可以用来养猪，发展队里的副业。队里规定，做豆腐的师傅实行计件核算工分，每做一锅豆腐记4个工分。其他队里的豆腐匠，一天起早贪晚只能做3锅，而这位年过半百的山东老汉，每天都能做出4锅。经他手做出的豆腐洁白如玉、老嫩适中，口感极佳，大伙儿都爱吃。

十一二岁时，我一有空就和同伴锁子去后院的豆腐坊。灶上架着柴熬豆浆，火苗舔着锅底，暖意融融。我一边烤火，一边看着那头蒙着眼的黑毛驴，沿着磨道一圈一圈的转个不停。打着围裙的豆腐匠，提前把泡得发胀的豆子徐徐填入磨眼。磨盘上方用三条绳子呈三角式吊着泥瓦盆，清水从盆中间的小孔细细

滴在豆子上，就像农家过日子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细水长流。白花的豆浆从石磨缝隙里缓缓流出，倾泻到磨盘底下接豆浆的桶里。桶满后再倒回大铁锅，灶火烘烤着豆浆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升腾起层层热气，冒出蓬松的白沫。待豆浆沸腾，老师傅用勺子撇去浮沫，豆浆的香气便飘出来，馋得我直流口水。

一进腊月，年味就一天比一天浓。大半个冬天过去，左邻右舍菜窖里储存的白菜、土豆、萝卜，大人孩子早就吃腻了。一天清早，我刚起床，母亲就让我去换豆腐。我赶忙穿上鞋，连棉帽子也没戴就跑了出去。一出门，大老远的就看见张家二婶端着搪瓷盆，大步直奔豆腐坊，刘二愣子腋下夹着二大碗，向豆腐坊

走来。我生怕去晚了换不到，就加快了脚步。赶到时，热气腾腾的豆腐坊里，邵老师傅正拿着刀和木尺，聚精会神地给刚出锅的热豆腐打块。

我捧着豆腐满载而归，只见东方红日早已冉冉升起，生产队院子里牛嘶马叫声不绝于耳。三三两两前来换豆腐的人脸上，都流露出坦然和满足。街巷里一排排土坯房，像田野里一垄垄丰收在望的金黄大豆一样，整齐划一。家家户户都洋溢着迎新年的气氛，连袅袅升起的炊烟里，也飘散着喜庆祥和的味道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当年生产队的豆腐坊早已不见了踪影，可那坊里飘出的豆腐香，却时常在我梦里萦绕，挥之不去的，是那浓浓的乡愁。

百姓故事

老书记

□ 焦健

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我正低头忙着焊接铁活，忽听大门轻轻一响，抬头望去，来人竟是许久未见的老书记。

他肩上扛着一把铁叉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铁锹，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：脊背比前些年佝偻了许多，原本乌黑的鬓角爬满了霜白的发丝，可脚下的步子，依旧沉稳扎实，骨子里还藏着当年担任村干部时的那股干练与精气神。只是一开口，语气里裹着难以掩饰的委屈与愤愤不平：“我去村东头小张的修理部焊铁叉，进门时，那小子正忙着给别人焊电焊，不等我开口，就不耐烦地说没时间。想我当村书记那会儿，全村的电焊活，我全揽给了他，一年实打实让他挣下四五万块钱，如今我退下来了，竟真是人走茶凉啊！”

我放下手中的焊枪，起身接过他递来的铁叉。那铁叉被磨得锃光发亮，只是叉齿处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隙，一看便是常年劳作的老物件。老书记在村里当了整整23年的村书记，一心扑在村里的发展上，后来因工作勤恳，被调到乡里当副乡长，是十里八乡都敬重的好干部。

1990年秋天，村里统一收购村民的蓖麻子，说好秋后统一结算钱款，可最后发到村民手里的，却全都是一张张白条。那年恰逢我订婚，家里急等着用钱凑彩礼，走投无路下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去老书记家求助。去时，他正和几位老友饮酒谈事，我攥着皱巴巴的白条，尴尬地站在门厅外的走廊里，低着头，连开口说话的勇气都没有。

他的大女儿端着水盆从屋里出来，

见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，便细声细气地问明我的来意，转身进屋替我向老书记求情。隔着半开的房门，我听见老书记沉稳的声音：“每户先兑现500块，多了我在做不了主。”他的大女儿轻声劝道：“爸，他这是订婚急用，你就破例再添500块，凑够1000块，帮他渡过这个难关吧。”沉默片刻，老书记松了口气：“罢了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拿着那沉甸甸的1000块钱，感激的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，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，我记了大半辈子。

后来，村里要修建灌溉渠，关乎着全村农田的收成，老书记为了替村民争取足额的工程款，与上级领导据理力争。也正因这份执拗，没多久他便被撤了职务，回到村里，做了一名普通的村民。

回到村里后，老书记买下一块宅基地，亲手盖了三间砖房。上梁那天，真心感念他恩情的村民们，都自发赶来帮忙搬砖、和泥、搭架子，热热闹闹地帮他把手新房盖了起来。

我握着焊枪，麻利地将铁叉的裂缝焊补平整，打磨光滑。老书记接过铁叉，连忙问我多少钱，我笑着摆了摆手说：“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哪能收您的钱。”他郑重地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缓缓转过身，佝偻的背影一步步走远，转过巷口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
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声清亮悠长的吆喝：“卖豆腐喽——”那声音在安静的村庄里悠悠飘荡，飘得很远，也很轻，像老书记一生的坚守与落寞，在岁月里静静回响。